

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丛书

俄罗斯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

庄宇 施越 主编

北京瑞龙大观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公司电话	010-84819146		
成品尺寸	155*232		
排版软件	方正2008	制作人员	石
校次	初校样		
送稿日期	2020.12.30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丛书”

编委会

钱乘旦 于殿利 宁 琦 夏红卫
翟 崑 王锁劳 咎 涛 李 昀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丛书
俄罗斯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
庄宇 施越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 - -

20 年 月第 版 开本 $\times$ /
20 年 月北京第 次印刷 印张
定价: 元

“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丛书”

总 序

钱乘旦

“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丛书”是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主持出版的一套丛书,旨在推动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向读者推介这个领域内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为有志于该领域的学者尤其是北大学者提供方便的传播渠道,并且为社会各界开辟一个集中阅读的园地。

对区域与国别进行研究,已经是当下中国一项刻不容缓的学术任务,需要学者们尽心投入,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更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与倡导。中国正在迈步走向世界,但障碍之一就是不了解世界,对外国的情况似懂非懂,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一无所知。中国要发挥世界性作用,或者解决因走向世界而面临的新问题,不了解世界是做不到的。而所谓了解,不是最低限度的知晓常识或毛皮琐事,而是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领悟,是了如指掌的沁透心脾,是根枝叶茎的全盘掌握。一个人举手投足,他头脑里想什么都会不自觉地表露出来。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就需要有这样的深度——从任何人的行为表象看到其思想的根、文化的根、社会的根,由此看懂他的目标所在——这个深度,就要靠区域国别研究来提供。

区域国别研究是什么?笔者多次指出:它是一个领域,包括众多学科;它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只有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才能真正和全面了解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因此对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要求会非常高,只有多学科高水平的专家们协同合作,才有可能做一个真正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现有学科目录下的任何一个学科都无法单独支撑这个领域,只有共同努力,才能达成目标。出于这种认识,我们这套书就要尽可能囊括多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学科涉及面越大,丛书的价值就越高。多学科研究只有一个公分母,那就是从不同角度、不同维度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相关的问题进行观察和研讨,最终拿出高质量的成果。经过多年努力,我希望这套书成为一个百花园。读者在这个园子里看到的不仅是文科之花,也有理工工科之花,医科农科艺术之花……所以,我们欢迎各科学家都到这个园子里来栽花,让它成为名副其实的百花园。

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刚起步,它最需要的是人才,而我们最缺乏的恰恰是人才。所以,这套书也是一个人才培养的园地,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年轻学者加入到作者行列中来,通过写书和出书既培养自己,同时也推动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队伍建设。从事区域国别研究有一些基本要求,比如语言要求(研究对象国的语言能力)、经历要求(在对象国有较长期的生活经历)、专业要求(有特定的专业学术素养),等等。这些要求是青年学者必须具备的,也是我们评判入选丛书的学术标准之一。

本丛书出版得到北京大学校方的全面支持,没有这些支持,也就没有这套书。本丛书也得到各位作者的通力配合,没有他们配合,我们做不出这套书。本丛书在商务印书馆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出版,在此向出版社表达敬意。丛书的问世只是开始,丛书的目标属于未来:丛书将一年一年地往前推进,每一年都推出新的好书。

谨识,2019年12月于北大

目 录

历 史 编

个别主义帝国:俄国在中亚的改宗和征兵政策 宇山智彦	3
俄罗斯帝国的母国、殖民地和帝国公民性 亚历山大·莫里森	45
沙俄对哈萨克草原东部地区统治政策初探——以 1822 年 《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为中心 施越	90
帝国时期的俄国权力史:研究方法论问题 德米特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安德列耶夫	117
19 世纪下半期至 20 世纪初俄国工商业政策与经济发展 张广翔	135
土地关系的变革与俄国村社制度的危机 罗爱林	154
苏俄国内战争时期南俄白卫军的政权建设与管理研究 周国大	191

当 代 编

俄罗斯:“民族认同”与“公民认同”的博弈与认识 张建平	220
俄罗斯民族国家建设的历程 刘显忠	238
当代俄罗斯的政治思想 庞大鹏	265

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之后,沙俄在中亚地区的扩张如疾风骤雨一般。但“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之”,沙俄在新征服领土上的制度建设却鲜为前人学者关注。在沙俄的中亚地区统治体制发展过程中,1822年条例具有奠基性作用。在1822年之前,沙俄更多强调对草原东部地区因俗而治,即通过封赏部族首领,获得柔性甚或仅有象征意义的控制。而1822年条例在行政上将冠以“苏丹”名号的部族首领转为边疆当局领导下的区、乡和阿吾勒各级官僚;在地缘政治层面,各区乡划定疆界,以区乡和要塞线力量限制越界游牧;在社会经济方面,通过土地利用、税收、文教和社会保障等手段优待定居人口以削弱哈萨克人的游牧传统。

1822年条例标志着沙俄对中亚的统治从19世纪以前的“因俗而治”转入更为直接的军政统治。此后,随着沙俄在19世纪中期派遣重兵征讨浩罕、布哈拉和希瓦三汗国,吞并土库曼人游牧地区,终建立以突厥斯坦总督区(1867—1917年)和草原总督区(1882—1917年)为支柱的中亚统治体系。两者对应的1886年和1891年管理条例将土著政府的层级压缩到乡、村(农耕区)和乡、阿吾勒(牧区)两级,以更为细致的条款规定乡村两级政府和毕的选举流程,以更大力度介入习惯法所规制的民事诉讼领域。概言之,1822年条例标志着沙俄对哈萨克草原地区的统治政策从羁縻转向建置,旨在抑制草原地区大规模游牧政权的出现,将草原地区从“危厄边疆”逐步转为帝国纵深腹地。

作者简介:施越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助理教授。

帝国时期的俄国权力史:研究方法论问题

德米特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安德烈耶夫

对帝国时期俄国历史的研究是多角度的。近来最流行的一个研究路径,是探寻多民族性是如何与中央集权的管理体系,更重要的是,如何与占主导地位的、统一的文化相融合的。这种文化显然不仅是简单的“民族间交往的语言”,它更为重要的意义是用来整合俄国广阔的欧亚空间。从民族性的角度研究帝俄时期的历史,许多方法论层面的创新就出现了,它们都涉及相关的人文(有时不止是人文)学科。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下学界对帝国权力现象的研究明显是滞后的。表面上看,这个题目不时发生的政治化确实产生了影响:苏联解体后的最初几年里,政治史被看作简化了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原则的对抗,这并不符合丰富而复杂的现实。如今,这种做法已经完全不合时宜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些概念,例如下面将要谈到的“日常政治”,但这些概念和正确理解过去也相去甚远。本文在一些西方思想家著作的基础上,从方法论角度提出了一些思考,或许可以让我们更为准确地了解到,18世纪至20世纪初的最高权力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专制制度的起源及其决策的执行人——即官僚集团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我们应当从这个问题的总体入手。18世纪初的二十五年,彼

得大帝施行了自己规模宏大的改革。其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国家机构可以高效地、有力地保证国家的发展及其外交利益的达成。彼得大帝认为,这种高效性可以通过借鉴西方国家体制和西方官僚文化来实现,同时,他在位时期用绝对权力保证了这种借鉴的成效。沙皇可以与他设立的参议院分享自己的最高权力(这一机构的职权分化最初并不明晰),但是鉴于他所处的绝对高位,这种做法绝不会威胁到他的权力。

但到彼得大帝的继任者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些恰好处在新机构领导职位上的上层政治精英们,不止一次地试图借助君权加强自己的力量,或公开坦率(就像在1730年所做的那样)或含蓄间接。但在当时,由于自己的弱小和年轻,新的制度性官僚阶层还无法与专制制度相抗衡。

自彼得大帝时期开始发展的俄国官僚阶层,在他去世后愈发成为君主施行自己意志时不可或缺的工具。这个阶层的宗旨,可以被称为是俄国版本的官房学派。众所周知,这一在三十年战争后的德意志出现的观点体系被概括为,国家机构必须严格遵守其职能目标,以利于国家总体财政状况的改善。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官房学派被不同的欧洲国家所接受,然而在俄国,正如上文提到的,官房学派的实践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俄国官员开始将这种严格而实用的功能主义阐释为一种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专属地位。

在西欧,官僚功能主义必然以君主控制下的机构体系的形成为前提(不同国家中这种控制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抛开它,就不可能达成完整的政策,也就不可能有健全有效的财政管理)。这样,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现代统治史”是从“职业官吏的集体式机构的发展”开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吏团体”只有在成为一个“集体”,即“团结一致”的前提下,才能对君主进行“政治上的控制”(大公们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外行统治者”)。并且按

照韦伯的逻辑,在这样的情况下,君主们实际上帮助了这些“团体”。由于单独的官吏可以更有效地对大公进行“持续而坚韧/顽强的抵抗”,所以当后者自己意识到这种“不可逆转的向专业官僚统治过渡的趋势”时,就会去建立“集体协商制”,以便保住“主宰者”的位置,即使其本质仍是一个“外行统治者”。当“理性的职业官僚”取得“最终的不可改变的胜利”的时候,从一个独一的中心发出的管理——即在一个首相的帮助下——对“集体”来说就变得十分必要。当君主和“集体”开始互相掩饰的时候,上述情况就出现了。这样的管理中的“独裁”的确立,便意味着官僚主义的胜利。^①

在俄国,官员觉得自己就是自己工作职位上的小独裁者,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从自己的职位上最大程度地捞取这一地位带来的好处。这种好处不一定就被认为是贿赂,可能是建立有利可图的联系,或是获得某些特权,或其他的一些东西。官员把构建功能性系统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上司,而上司又将其交给了自己的上司。于是,一切又都寄托在皇帝身上,他不得不保证这个官僚金字塔内部的联系。在这种情形下,官员与这样的上司之间,以及与他最大的上司——皇帝之间,自然就产生了对立。最初,这种对立情绪只限于对直接的上司,而且大多是在暗中的。但在权力内部,这种冲突的逻辑和方向是相当明确的。这一切恰好发生在18世纪下半叶,也就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

然而,除了这种案头的对立之外,叶卡捷琳娜二世治下,贵族官员精英们的另一种对立情绪——意识形态上和行为上的——也拥有了基础。叶卡捷琳娜不仅参与谋杀了她的丈夫——皇帝彼得三世,而且违背了几个世纪以来的王位继承传统,剥夺了她的儿子保罗——即使在他成年后——在父亲死后登上王位的机

^① Вебер М. Хозяйство и общество: очерки понимающей социологии: В 4 т. Т. I. Социология. М.: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Высшей школы экономики, 2016. С. 317.

会,并开始亲自执政。为了博得贵族精英的好感,她不仅使贵族摆脱了义务服役的束缚,而且允许贵族实行自己的阶层自治,这成为与专制政治文化完全格格不入的绿洲,最终成为反对派自由主义情绪的源头。

正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确立了一种存续到 1917 年君主专制消亡的权力运行模式。这种模式包含在一个相当复杂的专制君主与他的权力工具——集中在国家机构中的官吏的共存中,而专制君主仍是发展的主要和唯一的主体。一方面,这种共存保证了解决管理任务时的伙伴关系;另一方面,权力主体(即专制君主)与其工具(即官僚制度和机构)之间的矛盾则不可避免地加剧。后者试图从工具变成平起平坐的伙伴,而这只有通过限制皇权、将其从专制转变为宪制才可能得以实现。这就是为什么官僚阶层成为了自由主义政治价值观的主要载体。

整个专制国家随后的历史,都是专制制度逐渐让位、官僚集团逐渐强大的历史,或者至少是放缓了的这一进程的历史,就像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那样。亚历山大一世的统治奠定了专制权力在其剩余存在时间里的运作模式,这一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进行政治改革不是为了使国家的状况发生质的变化,而是为了改革本身——为了模仿对启蒙运动理想的热衷,而启蒙运动理想当时被认为是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最准确的表达。所以问题就在于模仿,在于建立专门的模仿的机构。创建于 1810 年的国务会议(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совет)并不是议会,而是最高官僚集团的研讨法案的机关。换句话说,它只不过是某种表象,但即便如此,它还是创造出了新的政治现实。从此之后,未经事先讨论,皇帝不能再颁布法律(закон),皇帝的特权仅限于颁布个人命令(указ)。在俄国的立法实践中,没有将问题明确划分为需要通过法律解决的和需要通过个人命令解决的。但事实上,更根本的问题必须通过法律解决,即通过国务会议的审核研讨。此外,即

使是模仿的机构,也塑造了某种政治习惯,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为了改革而进行的改革只发生在纯粹的官僚领域。尽管 18 世纪的国家机器远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潜力,但亚历山大一世还是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俄罗斯帝国的“部”体制。相比 18 世纪的“院”(Collegia/Коллегия 效仿瑞典的国家机构建制,相当于“部”——译者),此时的部是更集中、更具有垂直组织性的机构。由此,皇帝对大臣们的依赖明显加强,他们成了皇帝的主要的信息传递者,向皇帝报告由他们负责的各个国家管理领域的情况。尽管在没有出现首相领导的统一政府的情况下,我们没有理由说,此时已经形成了大臣们的专政,但仍旧不能低估最高统治者与其统治工具之间关系的质的变化。很明显,在没有集体政府内阁的情况下,大臣个人向皇帝呈交报告的做法,使皇帝依旧保有着主要和唯一决策者的位置。但这里形成了某种特定的管理传统,即从这些模糊不清的执行者中脱颖而出的部长们变成了可靠的信息传递者,没有他们,最高权力也就不复存在。

通常认为,亚历山大一世的继任者尼古拉一世是其兄长的对立面,因为他甚至拒绝对任何可能被认为具有自由主义内容的做法进行模仿。然而,实际上,尼古拉一世不仅没有放弃亚历山大一世的既定路线,还在很多方面都对其有所发展。一方面,与亚历山大一世不同,他不仅没有作出要恩赐宪法的样子,还采取完全相反的行动,在控制社会舆论方面施行了保守守旧的政策。另一方面,国务会议继续运作,帝位被官僚包围的状态大大增强。皇帝设立的御前办公厅,本意是为了控制官僚垂直部门的活动,但实际上它变成了一个额外的官僚机构,且履行职责不力,迫使皇帝不得不亲自深入诸多循规蹈矩的管理问题中去,使他“神圣”的专制君主形象变成了一个检查整个国家机器的形象。

这种单方面延续的亚历山大一世的路线,即没有自由化的官僚化,在尼古拉一世死后和亚历山大二世登基后,对之前 19 世纪

初的形势造成了一种挫折。当时的高级官员不仅是沙皇权力事实上的伙伴,而且是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传播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亚历山大二世时代的自由主义官僚现象,他们成为了大改革(将农民从农奴制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土地改革,建立地方自治,司法改革和其他的改革)的主要发起者和推动者。自由主义官僚认为,只有当俄国的现代化不仅是功能性的——技术上和组织上的,而且变为社会政治的,即可以保证公众参与管理的自由和机会时,才有成功的可能。

在历史学的语境中,19世纪下半叶的社会公众(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ь)被极度神话化了,被看作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是其成熟化的表现。由此,公众产生了对参与至少地方一级政权的要求。而同时,在此前的俄国从未出现过任何形式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某些要素仅在贵族自治中出现过,而就算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也不过是一些要素、特征和潜质罢了。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社会公众则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群体包括下层官员,以及众多公职人员、专业人士,还有通过新闻媒体制造舆论的人。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的1860—1870年代大改革,造就了一大批这样的“新人”。

和在君主合作中注定失败的上层官僚不同,社会公众认为自己不需要承担这种义务。因此,他们主要的,事实上也是唯一的动机是破坏国家的现有秩序。他们认为这种秩序是不公正的,因为它没有提供他们认为自己应得的在权力中的位置。

这样一来,作为大改革的后果,在俄国形成了一种新的现实,迫使彼得大帝改革创造的官僚专制制度走上了一条别无选择的发展道路。从18世纪末开始,君主专制意识形态的官僚主义外壳不仅力图摆脱其从属和工具地位,成为君主事实上的“共同执政者”,还造就了一种敌视皇位的政治价值观。在上层官僚集团中,这些价值观念更多是以一种潜伏的形式存在着,它表现为这样一种信念,即君主迟早会像欧洲国家那样从专制转向宪制(更

准确地说,就像当时俄国关于欧洲宪制流行的神话一样。因为从形式上看,当时的主要君主国,更不用说帝国型的君主国了,都很难被看作是宪制)。而在下层官僚团体——即所谓的社会公众中,反对政体的声音变得公开化,他们毫不掩饰对专制制度的敌视态度,希望进行更彻底的政治变革。

因此,1905年,出现了两种对这一矛盾的解决方式,这都是征兆的。社会公众此时拥有了一个真正的议会——国家杜马,而上层官僚集团则拥有了首相领导的集体政府内阁。几年后,这两个机构开始合作运转;杜马对其最中意的和最不中意的大臣形成社会舆论,内阁在行动中试图获得大多数代表的支持,尽管这些代表不是他们,而是皇帝选出的。这样的分工下,专制君主变得多余,并从1917年2月起不复存在。

在审视这两个世纪的总体情况时,我们应该着重讨论一下其中被学界鲜少关注的时期——改革后时期的后半段,即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时期和尼古拉二世在位的前半期,到1905—1906年根本性国家体制改革之前,这些改革意味着法理上(de jure)君主专制的终结(这些改革后专制是否依旧存在,是一个单独的问题,需要独立考虑。应当指出,法律上它已经不存在了,而后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这样的状态从法律事实变成了客观事实)。换句话说,我们讨论的是1881年之后(亚历山大二世驾崩,亚历山大三世登基),一直到1904年底的这段时间(1905—1906年政治危机开始的前夕,这场危机至今仍被继续称为“第一次俄国革命”,但抛弃苏联历史学的这一传统,将其称为一场以改革为结局的危机,是更正确的做法)。

对这几乎四分之一世纪的研究,比对其之前和之后的时代的研究都要薄弱,这一现象倒是很容易解释。

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长久以来一直吸引着研究者的注意,因为正是在他统治下进行的大改革,极大地改变了整个国家,并

预示了它在 20 世纪初的更进一步的转型。

诚然,这种对改革的关注导致了历史学家兴趣点的某种偏移:被研究的首先也主要是改革——它的准备、过程与结果,而政治过程本身往往只作为一种背景被提出来,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因此,1881 年 3 月发生的君主的更替被看作里程碑式事件,尽管苏联历史学家扎伊翁奇科夫斯基(П. А. Зайончковский)(第一位专门研究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末期到亚历山大三世统治初期的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是一个过渡时期,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段。^①但无论如何,对大改革的密切关注确实发挥了作用:对于 1855—1881 年的政治史,当前研究任务需要做的只是进一步明确,而不是任何形式的重新发现。

对 1906—1917 年的所谓杜马君主制的研究是更为充分的,这也是很好理解的。原因非常明显,在苏联时期,对俄罗斯帝国末期的评价是极端政治化并具有倾向性的。自 1990 年代开始,这段历史被彻底重新书写,诸多新史料出版并被科学地使用,揭示了二月革命前 11 年那段历史的复杂性和模糊性。^②可以肯定地说,如今,对这一时段的新的史学认知已经大体固定下来,存在的讨论是就个别局部问题进行的,就此而产生的意见分歧通常超出了历史认知本身,而更多涉及世界观问题。

然而,对于 1881—1904 这段时间依旧存在很多问题。将它称为所谓的反改革时代,显然是不恰当的。近来,“保持稳定”的

① 扎伊翁奇科夫斯基讨论了亚历山大三世时内务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Н. П. Игнатьев)提出的重开缙绅会议的提议,他将其看作是前一王朝的改革传统的延续。他在这里的暗示是,从缙绅会议开始,或许会“在已知条件下导致其他结果”。参见:Зайончковский П. А. Кризис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на рубеже 1870—1880 - х годов.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64. С. 472。

② 参见:Гайда Ф. А. Власт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ь в России: диалог о пу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1910—1917). 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Дмитрия Пожарского, 2016. 604 с。

概念被用来作为这“一个半”沙皇统治的主要特征。

这一时期还有其他的名称。例如,米罗诺夫(Б. Н. Мironov)在他试图在如今完全解释清楚俄罗斯帝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三卷本大作中,谈到了作为大改革结果的“全阶层的合法君主制”的形成,在这种制度下,形成了构建“权力的合法形式”的条件,皇帝由此受到法律、地方自治和公众舆论的限制。然而,尽管亚历山大三世对大改革作了调整,但国家还是朝着君主立宪制“继续发展”。改革后时代的最后二十五年,俄罗斯帝国的政治体制“在不损害合法国家的形式的限制里,将一个合法的或规范性的国家和一个在法律框架内运作的行政制度结合起来”。

同时,虽然倒数第二位君主的统治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专制的顶点,但沙皇本人还是受到了某些非常明显的制度约束。国务会议以及“整个官僚集团”都“在很大程度上”束缚着沙皇,“官场上的反对派”甚至“逼迫”他放弃了自己的一些意愿。^①

在俄罗斯,传统上,政治主体性要么表现为权力的垄断,要么表现为权力的主体性要比那些公共人物的主体性强得多,这些公共人物与权力或提供权力的结构都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一方面,评估一个存在并伴随某种时间间隔稳定再现的政治制度的主要标准,恰恰是权力的状态、特征和性质。另一方面,研究某一政治体制,实际就是研究其权力。也就是说,权力(它的现象、特征和矛盾)应该像是某种光学系统,通过它,我们可以得见时代的独有特征,且这些特征在此期间保持不变或相对不变。换句话说,对俄国来说,包括专制时期在内的政治史就是其权力史。

然而,一个必然的问题就出现了:究竟应该如何、从什么角度研究权力?索洛维约夫(К. А. Соловьев)在最近出版的专门论述这一

① Мironov Б. Н.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 от традиции к модерну: В 3 т. Т. 2. СПб.: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2015. С. 406, 411, 410。

时期俄国政治制度流变的专著中,提出了“日常政治”(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的概念,将其作为一种研究工具,他把这一概念称为对雅克·勒高夫的“新政治史”的发展。根据这一概念,不应优先分析与权力有关的具体事件,而应优先分析权力的“结构特征”,即那些定义了“政治的”这个词的特性。在索洛维约夫看来,这种方法将极大地降低重构图景的主观性,因为具体事件——同时意味着还有反映着它们的源头——倾向于展示“例外情况”,而它们会导致“对常态的歪曲看法”。“日常政治”则正是与规范、普通、惯例、程序、实践及“灰色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与那些比起极端情况来更为可信的、在源头中反映出来的情况结合在一起。此外,正如索洛维约夫所确信的,“日常政治”的结构转变进行得“极其缓慢”,这使得研究者能够更详细地研究过去,从而更准确地对其进行描述。

“日常政治”的另一个特征也很重要:它对人的兴趣并不大,而是更愿意研究那些制定“游戏规则”的机构,正是在这样的规则中,我们可以找到具体事件发生的原因。换句话说,索洛维约夫提出,对“价值观”之外的原因、条件的研究比对结果的分析更为重要,可以更准确地再现和解释历史真实。总之,他主张以“日常政治”代替政治事件。^①

这种做法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它似乎不仅不能使我们更接近理解历史真实,而且实际上还引发了它的新一轮神话化。这主要是由于索洛维约夫试图有倾向地以20世纪西方思想家的成就来支持他的概念,而这些成就近来已被吸收到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框架之中。

索洛维约夫对施米特的思想的运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① Соловьев К. 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 1881—1905 гг. : проблема законотворчества. М. :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18. С. 8—12.

在向读者介绍自己的主要论点——专制制度在其官僚的外壳中消解,索洛维约夫引用上述这位德国学者的话说,所谓的“专制国家”,“在本质上”就是“行政权和政府的国家”。在另一处,他又引用施米特关于“法制国家”的说法。用索洛维约夫的话说,这是“非个人化的决策过程的胜利”,是“懂得政府如何运作的专家的国家”,是一种“缺乏能将战术决策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相结合起来的政治力量”的制度。在他看来,上述施米特所说的特点恰好符合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国的权力模式。^①

无疑,在施米特对欧洲专制主义国家的重构与19、20世纪之交的专制主义之间建立上述类比是有根据的。但据此并不能说,俄国统治者的行为就和韦伯所说的君主一样,后者感受到了自己在管理上的游离状态,他们一方面要“避免高度职业化的官员的影响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力图“将最高领导层控制在自己手中”。^②沙皇们竭力证明着自己脱离官僚群体的独立性,而这种努力的顶峰恰恰是在19、20世纪之交。他们的做法可以用施米特提出的两个模型来概括,而索洛维约夫对此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第一种模型,是某种理想型的主权者。对此索洛维约夫只是顺便提及,^③但对它理应有更深入的思考。施米特提出的这位主权者是这样一种形象:他在国家中创造出一种本质上新的政治现实,他“站在现行正常的法律秩序之外,但仍然隶属于它”;他可以拥有“宪法规定的不受约束的权力”,在法律规定的权限框架之外行事;当旧情态由于与当下不符而被自己废除时,他就是新情态的创造者。因此,“非常状态”是界定主权者能力本质的最佳时

^① Соловьев К. 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 1881—1905 гг. : проблема законотворчества. М. :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 21, 102—103.

^② Вебер М. Политика как призвание и профессия Вебер М.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М. : Прогресс, 1990. С. 659.

^③ Соловьев К. А. Указ. соч. С. 100—101.

机。也就是说,借助“日常政治”,诉诸常态和“灰色日常生活”,是不能理解主权者的现象学的,因为他正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表现出自己的特殊性来。“规范证明不了什么”,施米特在谈到主权者时说,“非常状态却能证明一切;它不仅确认规范的存在,规范也只能来自非常状态”。^①

局限在“日常政治”框架内的方法迫使索洛维约夫从皇帝的这种实践中看到了“法律的不可动摇”的必要性与“专制神话”之间的矛盾(而索洛维约夫似乎也认为,施米特式的主权者的行为准确地反映了俄国沙皇对自己使命的想法,不过书中并没有对“政治神学”的这一片段进行详细论述)。他认为,官员们对这一矛盾视而不见,甚至以豁免权的形式使主权者的这种特殊能力合法化,即在特定情况下允许对更普遍的秩序规范的否定和曲解。^②

但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将主权者权力归结为豁免权,这对于理解皇权的自我认知是错误的——而且是原则性错误——虽然就某些具体的立法实践而言也是正确的。尽管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俄国的最高权力无疑得到了合理化和常规化,但它对自己的认知还是中世纪字面意义上的“活法律”(живой закон/living law)现象,^③这种认识不仅没有向更现实的方向转变,甚至有所加剧。这一时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亚历山大三世艰难地

摆脱着自己的父亲留下来的定式——将实现自己最高管理权作为目标,摆脱着在位期间把自己、自己的家庭和威权的“日常生活”作为秩序、福祉与发展的基本和不可动摇的保障的统治习惯;再如尼古拉二世的一些有时看上去很奇怪的意图,往往在他在处理王朝危机、解决与最高统治权继承相关的问题,以及与当时政治有关的问题时表现出来。

俄国末代沙皇时代更生动、明显的例子——尽管超出了后改革时代——即1907年所谓的第三次六月政变,尼古拉二世正式违反了一年多之前他自己签署的新版《俄罗斯帝国基本法》。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在1906—1917年,专制制度既无法律保障,也没有事实保障,但最重要的是君主自己认为,他的特权在许多方面(并不是所有方面——君主自己也明白这一点)都没有改变,就像1905—1906年改革之前一样。

这个最重要的例子,预示了上文提到的后来对君主来说不可避免的、部级官僚对杜马的依赖,以及君主将自己的行为与公众舆论联系起来的必要性,而这些舆论,尽管有所失真,但是由杜马传达的。这样的例子是不能用“日常政治”的观点来理解的。

在“第三次六月政变”的例子中,这个问题被可以重新表述为:签署《基本法》的皇帝是相对于《基本法》而言的外部宪法力量,这种力量保留着进行非常的、合法的未经事先规定的修正权,抑或是皇帝也依旧处在这些法律所描述的空间之内,因此也必须遵守这些法律?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④但对于历史现实的重构来说,对它的表述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只看到过去的“日常政治”,那么这种重构原则上是不可能达成的。

^① 严格地说,比导致“第三次六月政变”的决定更公然违反成文法的,是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并将权力移交给他的弟弟,也就是剥夺了自己儿子的王位继承权。这些行为也只有在施米特的逻辑中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和解释。

^① [德]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刘宗坤、吴增定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1—32页。俄文参考:Шмитт К.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еология. Четыре главы к учению о суверенитете Шмитт К. Понят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 Под ред. А. Ф. Филиппова. СПб.: Наука, 2016. С. 10, 13, 15—17.

^② Соловьев К. А. Указ. соч. С. 48—49.

^③ 援引的是12—13世纪拜占庭圣典学家费奥多尔·瓦尔萨蒙(Феодор Вальсамон)和德米特里·霍马提安(Димитри II Хоматиан)的作品,联系施米特提出的与他们相关的关于“非常状态”的概念。伟大的法国拜占庭学者达日隆(Gibert Dagron)展示了那个时代帝国的法律实践如何对希腊化的思想做了肯定,即凯撒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活法律”。参:Дагрон Ж. Император и священник: этюд о византийском «цезарепапизме». СПб.: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факультет СПбГУ; Нестор-История, 2010. С. 33—34.

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也是这样解释施米特关于主权者的学说的,批评施米特的同时,他非常准确地阐释了主权者权力的主要悖论:“主权者同时处在法律体系之内和之外”,也就是说,“拥有中止法律行为的合法权力的主权者,将自己置于法律之外”,而“主权者的权力”本身就是“一种初始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法律与生活相关联,同时又将生活纳入中止自身行动的法令之中”。^①

索洛维约夫在思考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的“亲密圈子”的作用时使用了施米特提出的第二种模型,^②但他的这种使用是经验主义的,而且没有关注到这位德国学者在自己出色而精炼的作品中提出的掌权者与他周围直接环境的互动模式。这第二种模型恰恰就是主权者包裹模型。(正是这种包围被看作官僚阶层反对独裁政权的一种阴谋。同时,施米特所指的,不仅仅是,或者说与其说是官僚阶层的包裹,不如说正是主权者对恰好在他身边的人的依赖性的确立。)施米特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源于所有主权者的致命弱点——他原则上获取信息的能力是受限的。施米特指出,成为统治者的信息传递者的人,“已经分了权力的一杯羹”,他可以是任何官员——部长、文牍员,或者是能够“间接地让统治者的耳朵转向自己”的人。换句话说,这位信息传递者所做的不过是分享了自己的“印象和动机”,而他与之分享的那个人,则会在自己的决定中加入相似的——通常是主观的——观念。这是“直接权力”如何受到“间接影响”的模型。统治者意识到这种依赖性,并试图求助于其他一些人的帮助,而不是“自己的长期顾问”,结果他们发现自己被“新的且往往是怪异的依赖性”

所俘虏。

基于这样的观察,施米特总结出了关于两个互相关联的、与权力相关的空间的论述:“直接权力空间”及它以“间接影响和力量的前空间”形式存在的特殊外壳。这个“前空间”可能是一种“入耳通道”,或是一个特殊的“走廊”,沿着它可以真正到达“统治者的内心”。任何法律秩序和制度环境都无法“彻底消除”这样的“前空间”,想要绕过它是不可能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在“权力的前空间”中有一个由“中间者”——从部长和神职人员到副官、情妇和仆从——组成的“杂乱无章的混合社会”。“前空间”的形式多样,有“官方的国事厅”,“尊贵的先生们”在那里排着队向统治者作报告;还有“私人办公室”,不一而足。

权力越是集中在某一个人手中,占据“前空间”和掌控“走廊”的人们之间的斗争就越是激烈和无所顾忌。对于任何一个权力来说,这种“在间接影响的迷雾中的斗争”都是必不可少,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斗争反映了权力的“内在辩证法”。任何“直接权力的加强”,都使得“间接影响的迷雾”变得更加浓密而厚重。

统治者手中的“直接权力”越集中,他就越孤立。“走廊”恰恰“将他与根基撕裂开来”:现在他只能“间接”接触到那些他掌控的人,至于其他的被统治者,他们和统治者之间已经无法相互接触。统治者达到极限的孤立造成了这种情况,这种孤立可能是“权力机器”造成的。在实践中,这表现为“直接权力与间接影响的转化”,这种变化不断发生在日常生活的诸多现象中。

由此,施米特得出了他的主要结论:“向君主汇报的问题就是整个君主制度的关键问题,因为它们是可以到达高层的问题。”^③

这种“空间”与“前空间”的永恒冲突,其实是矛盾的。一方

^① Агамбен Дж. Номо sacer. Суверенная власть и голая жизнь. М.: Европа, 2011. С. 22, 40.

^② Соловьев К. А. Указ. соч. С. 84—89.

^③ Шмитт К. Разговор о власти и о доступе к властителю.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07. Т. 6. № 2. С. 31—33.

面,“中间者”不可避免地偷走了统治者的部分主权。另一方面,掌权者与“中间者”沟通的神秘性及其与外界的隔绝性本身,又保证了对掌权者统治的神圣性的维持。因此,反对“中间者”束缚的斗争,同时也是对主权者权力中不符合法律框架的性质即其无约束性的斗争。众所周知,在19、20世纪之交的俄国,正是部委报告中的“极权主义”成了官僚集团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而他们希望建立一个以首相为首的统一政府,这一公开的、形式上的理由,使得部门间的管理问题最终得以高效解决,这其中同样也包含了官员夙愿的隐秘含义——使君主接收信息的程序(也意味着他的决策程序)更加透明,从而使他的权力减少到宪法规定的程度。这就是为什么1905—1906年的改革实际上是与这些行动一起开始的:建立议会和一个由首相领导的联合政府。

俄罗斯社会学家菲利波夫(А. Ф. Филиппов)研究、翻译并出版了施米特的著作,他从统治者与“间接权力”的关系和权力本身的局限性两个方面对《关于权力的对话》(Разговор о власти и о доступе к властителю)作了重要评论。

菲利波夫指出,施米特的掌权者“不在权力的前空间中掌控事态”。他认为,这样的掌权者可能会在“前空间”中的“中间者”之间挑起争斗,但并不能肯定地说,这样的掌权者“从一开始就控制了游戏的结果”。这一点在尼古拉二世统治前半期的一些例子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沙皇感觉到官僚集团对自己权力的压制越来越大,于是求助于各种“普通人”参谋,而这总是会导致对名誉的损害(施米特所说的“怪异的”“新的依赖性”)。

菲利波夫指出了“权力的自法性(самозаконный характер)”。这体现在,发出命令的人“启动了一连串的原因和结果,但他却无法对其进行追踪”。因此,如果我们把权力看作是一种“实现目标的强大能力”,那么它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有效性便是值得怀疑的。权力可以同时被视作手段和媒介,但当它体现“在媒介本身”

的实践里时,“它作为手段的效果就会变差”。^①

上述由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国君主制而来的观察,同施米特的观点一起,可以被看作理解专制制度主要矛盾的基础。这种政治制度正是作为管理实践而先验无效的,但同时作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保障国家主体性和安全性的必然选择(尽管伴随着巨大的成本、不可估量的社会代价和大幅度跨越),它还是取得了与欧洲现代主义要求相符合的发展。

因此,亨廷顿把“君主-现代化者”看作提供现代化可能性的制度的“人质”,因为这个制度阻碍了“民众的政治积极性”的增强,^②这对于解释具体的俄国现代化是不适用的,原因有二。首先,从彼得大帝到1917年,专制君主不仅是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而且是现代化的条件和目的,这要从其不可避免性、生存性和动员性等方面来理解。由这种口号推动的现代化不需要任何人的“政治积极性”。其次,“政治积极性”不仅不必要,而且在这种现代化模式下,它可能并不能构成有利条件,反而成为变革的阻碍。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上述亨廷顿思想的发展似乎适用于描述俄罗斯的现代化:“现代化早期阶段的成功取决于这种传统制度的加强(即君主制——作者注),而现代化的进程又会逐渐削弱其合法性。”^③但这里理应对“很大程度上”做一个更明确的界定,因为亨廷顿所指出的趋势虽然也发生在俄罗斯帝国,但其结果应该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被削弱的不是君主的合法性,而是他作为现代化的“关键组成”的能力,也就是

① Филиппов А. Ф. Власть как средство и среда: два рассуждения на тему Карла Шмитта. Филиппов А. Ф. Sociologia: наблюдения, опыты,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Т. 2 / Под общ. ред. С. П. Баньковской. СПб.: Владимир Даль, 2015. С. 291, 293—295.

② Хантингтон 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орядок в меняющихся обществах. М.: Прогресс-Традиция, 2004. С. 178.

③ 同上。

说,如果我们一定要使用“合法性”一词,就不能从法律意义上理解它,而是要从超验意义的角度出发。

是的,专制政府是个糟糕的管理者,但它并不是韦伯所说的“外行”,因为没有专制政府,任何事情都行不通。这一点从1917年2月开始的革命就可以看出来,这场革命持续了10年,直到某个类专制复制品被重新制造出来。俄国官僚集团梦想着宪法,对最高权力极度不满,又对具体的管理问题无能为力,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外行”。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将自己的主权移交给了其他任何机构,专制制度从根本上不具有改革性。只有严格遵守以下这两个条件,俄罗斯帝国的现代化才能取得积极成果。第一,它应该以动员的方式进行,其中皇帝要成为这种行动的主要和唯一的思想上的开端。第二,它无论如何不能是对最高权力的削弱。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派在二月革命前夕提出的“不实行宪政改革就不可能取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的关键论点,从根本上说是站不住脚的。俄罗斯帝国只有在动员模式下,在最高权力的领导下,才能或多或少有效地解决其发展中的具体问题,首先就是涉及主权保障的问题。只有在这种时刻,它的潜力才会充分显现出来。而其他的发展方式——改革的方式,例如大改革——则必然会引发一种与专制不相容的新的社会现实的出现。

作者简介:德米特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安德烈耶夫,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副教授。

(赵正楠译,庄宇审校)

19 世纪下半期至 20 世纪初俄国 工商业政策与经济发展

张广翔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利使俄国政府彻底觉醒,意识到发展铁路交通和民族大工业的重要意义。俄国的工业要远远落后于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在这种条件下,国家干预就是发展工业的必然手段。俄国政府于1861年废除了腐朽的农奴制,解决了工业自由劳动力短缺的难题,国家开始对工业发展进行深度干预。19世纪70年代起,俄国政府开始加强对本国工商业的保护,不断提高保护关税的级别,外国商品进口量大幅度缩减,民族工业有了长足发展。俄国政府在国际资本市场大举发行国债,为铁路修建筹措了巨额资本,国家铁路网迅速扩大,拉动工商业进一步增长。19世纪80年代,俄国政府一方面大力扶植重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整体提高国外商品的进口关税,采用各种手段引进外资。19世纪90年代,俄国关税保护级别达到顶峰,财政部货币改革成功后,国家货币流通逐步稳定,国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空前高涨。这一时期铁路修建迎来了历史上第二个高峰期,俄国完成工业化。20世纪初的世界经济危机影响范围巨大,西欧各国的投资额锐减,俄国的银行资本和国外资本不断融合。1909—1913年是俄国工业第二次高涨时期,此时期大量外资投向俄国工业,至一战前,俄国的